

试论抗日战争中非洲华侨的贡献

李安山

海外侨胞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遗憾的是,对非洲华侨在抗战中的作用很少提及。少数学者关于华侨与抗战的论著对此略为涉及,但有的份量很重的关于华侨革命史著作和华侨与抗日战争的有关论文(集)对这一重要史实根本未提,这是有欠公允的。本文将从非洲华侨的抵制日货活动、非洲华侨抗日后援团体以及抗日救国募捐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力图客观地对他们的贡献作出应有的评价。

—

1928年的“济南惨案”充分暴露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非洲华侨虽远离国土,但对祖国的安危时时关心。马达加斯加华侨在当地侨领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揭露日本侵略阴谋的活动。中国国民党驻马岛支部创办了当地第一份华文报纸《侨民新报》,内容丰富,遍销各地。在侨领陈明沃等人的领导下,华侨成立了对日经济绝交总会。然而,个别华人奸商不顾民族大义,私自购进日货。身兼华人协会主席和对日绝交会主席二职的陈远标与奸商陈遇潜勾结将日本火柴引进马岛,受到华侨谴责。1930年的6月20日,负责宣传的何金泉在《侨民新报》上著文,对引进日货的华商进行谴责。陈远标不思悔改,反而向警察局透露了未申请备案的《侨民新报》以及抵制日货的领导人姓名。1930年7月14日晚,当爱国华侨集会时,陈遇潜等人冲击会场,遭到何金泉、祝展华等人的严厉痛斥。后来,警察来到国民党党部所在地,将何、祝等人拘捕。法庭判决《侨民新报》停办并罚款240元。马岛总督于次年2月将何金泉与祝展华驱逐出

胡文英:《非洲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华声报》1987年7月1日;李小玲:《非洲华侨与祖国抗战》,《西亚非洲资料》1994年第2期;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黄小坚、赵红英、丛月芬:《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华侨协会总会主编:《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下),台北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魏宏运:《抗战时期的华侨捐输与救亡运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华侨协会总会编著:《华侨名人传续集》,台北黎明公司1987年版,第399—404页。

斯拉威斯基:《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华侨的政策》(Slawews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康涅狄克1971年版,第141页。



境。华侨抵制日货的斗争受到打击。

殖民政府对华侨的干涉并未降低他们抵制日货的热情。1932年,迭戈-苏瓦雷斯的警察局长在报告中提到,华侨因抵制日货与日本海员发生冲突,双方打了起来。华侨对日货的抵制持续进行。当地一家报纸《马达加斯加殖民报》于1939年2月18日披露,“受国民党支配的华人协会”决定将偶而进口日本水泥的D公司列入他们的抵制名单,“据报告国民党已决定对任何与这家公司有些许来往的华人处以5000法郎的罚款”。一位法国商人也在塔马塔夫商会抱怨,他因为向日本运送石墨而遭到华人的抵制,而在他的顾客中,华人占了50%。这位法国商人不得不承认,他对这种抵制无能为力。

留尼汪华侨对雇用日本船运货的公司进行坚决抵制。当时,一些印度公司在此岛设分号进行批发业务。1931年12月,一家名为“卡里姆吉-诺尔巴耶”的孟买分公司雇用日本船从西贡将大米运往该岛。华侨得知后对该公司进行抵制。他们宁可到价格较贵的欧洲商号购买粮食,而不与这家印度公司打交道。这家孟买公司的经理主动找中国驻孟买的外交机构交涉。他声明以后决不用日本船运货,并恳请南京中央党部转告留尼汪华侨尽快解除对该分号的制裁。为了确保中国领事馆向南京转达此意,这位经理次日又递交了一份不再用日船运货的声明。

毛里求斯华侨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号召华侨不买日货并烧毁日货。毛岛一直是日货的畅销地,主要是因为日货便宜。此外,很多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唯利是图,对华人抵制日货的呼吁置若罔闻。尽管有这些障碍,抗日救国后援会仍然团结全体华侨一致努力,决定“更努力寻求断绝仇货与断绝敌人资源的有效办法”,“以实在完成出钱救国与根绝仇货之神圣工作”。一位华侨曾回忆他抗战时在毛岛读书的情况:“当时我们每天都穿童子军制服上学。童子军的腰带上有一个钩子,挂着一个搪瓷饭碗。有一天有人说,这种碗是日本货,于是群情激愤,要求童子军教员让大家在操场集合,正式宣布搪瓷碗是日货,于是每人都把自己的碗取下来摔在地上,再使劲踩坏,以泄对日帝的满腔仇恨。”

东北沦亡以后,海外华侨采取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南非华侨积极募捐以支持国内军民抵抗日寇侵略。当时《南大与华侨》的一则报道称,“以南非而论,数千华侨,年来所募捐,计达百数十万元。仍能继续努力。”南非德兰士瓦的华侨师生成立了救国会,积极参加各种募捐活动。七七事变后,南非华侨也曾广泛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37年12月,拥有600名华侨的东省中华会馆组织华侨在伊丽莎白港举行抵制日货大游行,近30辆汽车载着各种标语,游行队伍打出的口号是“抵制日货!购买英货!”

引自斯拉威斯基:《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华侨的政策》,第142页。还可参见华侨协会总会编著:《华侨名人传续集》,第399—404页;陈铁魂:《马拉加西共和国华侨概况》,台湾正中书局1989年版,第42页。

斯拉威斯基:《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华侨的政策》,第143页。

陈英东:《模里斯华侨概况》,台湾正中书局1989年版,第56页。

陈伊美:《模里斯华侨的爱国热》,《华侨战士》第8期。转引自蔡仁龙、郭梁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福州中国华侨协会1987年版,第650—654页。

刘新舜:《我在毛里求斯的见闻》,《广东文史资料》1986年第47辑,第50页。

叶慧芬、梁瑞来:《肤色、迷茫与让步:南非华人史》(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香港1996年版,第261页。

二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非洲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组织。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统计,抗战时期,非洲华侨共成立了25个救国团体,计南非联邦5个,葡属东非5个,法属东非14个,毛里求斯1个。根据本人的研究,这一统计很不全面。首先,南非抗日组织远多于此数。其次,毛里求斯的抗日组织不止一个。再次,统计未将英属东非包括在内。除了少数以外,非洲华侨的绝大部分抗战组织成立于七七事变之后。

南非侨胞纷纷成立救国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日战争。虽然捐款多在中华会馆领导下开展,但抗日后援组织不甘人后。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埃滕哈赫和弗雷尼京等地成立了抗日后援会,在约翰内斯堡、纳塔尔、东伦敦等地成立了妇女协会。大部分市镇都成立了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南非华侨大学生成立了大学救济基金,还有老同学俱乐部、航空协会直属分会、援助自由中国基金等组织。最为突出的是德兰士瓦华侨妇女协会(即“杜省华侨妇女协会”)和伊丽莎白港的东省中华会馆。德兰士瓦华侨妇女协会于1937年9月成立,“以具体行动来表示爱国之热诚,四处奔走劝募筹款,源源汇款国内”。会员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募捐计54次之多,共计3万英镑。

东省中华会馆的华侨积极捐款。该组织的秘书指出:“东省的华人都答应开展月捐,商人们自然做得最好,甚至一般的店员也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捐出以表示他们作为国民的义务。”一位姓刘的华人因年老体迈,月捐不便,便变卖财产,一次捐款2000英镑。南非侨胞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深恶痛绝,纷纷募款以作“诛逆之奖金”。首轮捐款达到7000英镑。

毛里求斯华侨在七七事变后将原来的华侨救国会改组,命名为“华侨救国委员会”,后更名为“华侨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由华商总会、护商总会、仁和会馆、南顺会馆、新华学校、培英学校及国民党直属支部联合组成,由直属支部及华商总会“负总管之责”。抗敌后援会成立的次日,“即商请资遣贫侨会拨出款一万盾,先行直接电汇于中央侨务委员会转军事委员会,表示模里斯(即毛里求斯)全体华侨,誓为政府抗敌后援的第一项礼物”。后援会的工作包括捐款宣传、首饰运动、购买医院药物、征集麻袋及旧衣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后援会还经常放映宣传抗日的电影,“不少侨胞从山顶专门到埠上(路易港)来观看”。1937年冬,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毛里求斯直属分会成立,以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

在抗战中,中国国民党驻马达加斯加支部发展了1700余名党员,先后建立17个分部和13个通讯处。国民党支部与抗日后援会紧密配合。在捐款活动中,有的华侨废寝忘食,“自朝至晚,没有进餐,枵腹从公”。桑巴瓦地区华侨的贡献值得一提。该地区华侨不过130人,在抗日救国分会组织下长期进行月捐。他们组织了“救国白话剧团”,先后筹款20万余法郎。自

叶慧芬、梁瑞来:《肤色、迷茫与让步:南非华人史》,第255—277页。

欧铁:《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台湾正中书局1991年版,第69页。欧铁提出德兰士瓦华侨妇女协会成立于1938年(书中误印为1983年),此说有误。该协会成立的日期实为1937年9月。

叶慧芬、梁瑞来:《肤色、迷茫与让步:南非华人史》,第261页。

陈铁魂:《马拉加西共和国华侨概况》,第38页。

1937年8月15日成立至1944年底止,该地华侨所捐献的款项已经汇回祖国的达246.5万余法郎,后来募集的款项又汇回祖国14万余法郎。该区捐献成绩之所以如此显著,主要是因为华侨以大局为重,主动进行各种捐献,如工资捐、牌照捐、节食捐、土货捐、消遣捐等。更重要的是,抗救会的职员认真负责,取得了广大华侨的信任。

抗战后期,国民党的中央海外部发动“鞋袜劳军运动”。马岛华侨认识到这是捐输救国的最后机会,纷纷慷慨解囊。国民党马岛支部积极组织了这一运动,并在抗日后援会的支持下进行劝募。塔马塔夫的第一分部推定霍锡标等6人为劝捐员;塔那那利佛第三分部推定霍恩连等7人为劝捐员;瓦图曼德里第五分部将所属地区划为7个区进行劝募;桑巴瓦第十一分部派员前往山区进行劝捐。结果,马岛华侨共捐款240,750元。在1944年5月,马达加斯加华侨将524.5万法郎汇回国内以资抗日。由于法国殖民政府严格限制将外汇汇出本地,当地华侨在1944年以后为抗日救国进行的另外12次募捐款项直到1945年底才在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馆的协助下,转到国内。这笔捐款高达163万法郎。

全面抗日开始后,留尼汪华侨自动组织救国团体,展开救国活动。1937年,留尼汪圣但尼市的妇女组织了中华妇女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当地华侨中享有盛誉。该会举办演剧筹款或其他募捐活动中所需的一切费用,均在会员所缴月捐中支付。她们的劝募原则是华侨献一钱,祖国多一钱。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留尼汪的中华妇女救国会曾先后10次汇款至国内(指存有单据者)。“她们出钱出力热诚爱国的精神,感动着全岛华侨知识妇女纷纷要求加入该会”。此外,留尼汪还成立了华侨救国后援会、救国合群剧社、华侨救国剧社和青年白话剧社等抗日后援团体。

在埃及,华侨仅有64人,设有两个社会团体。留学生联络开罗的华侨组织了“中国战区灾民救济会”,由马坚任会长。1937年底,世界网球冠军许羽基访问开罗。受日本的欺骗,当地报刊以为这位印尼华侨是日本人。为了表明真相,留学生决定为许羽基开欢迎宴会,邀请多位记者,由他本人来揭穿谣言。许羽基宣布自己是中国人,并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39年2月,埃及的中国留学生赴麦加朝觐。朝觐期间,马坚、庞士谦密切监视日伪“华北回教联合会”朝觐团的行动,使他们不敢为日伪政权作宣传。在朝见沙特国王时,马坚代表中国朝觐团向国王递交诵词,说明抗日决心。在回埃及的船上,马坚用广播进行演说,宣传中国穆斯林拥护抗战的情况及日机轰炸各省回教区域与清真寺的惨况。“最后引经据典说明日本野蛮无理,必遭主怒,并引事实证明中国为正义,求生存抗日之是,日本侵略之非。说完时,全船掌声雷动”。他还为留学生朝觐团拟就《告世界伊斯兰教同胞书》散发给朝觐者,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并将该文译成中文寄给国内报刊。

在葡属东非,华侨主要集中在贝拉港和洛伦索-马贵斯,他们成立了5个救国团体,积极募

《侨声报》(南非)1945年7月19日,1945年7月31日。

黄素珍:《马斯克林群岛的华人移民社群:以留尼汪为例》(Edith Wong-Hee-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éunion*),巴黎1996年版,第239页;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6年版,第53、70页。

庞士谦:《埃及九年》,北京月华文化服务社1951年版,附录;还可参见李振中:《学者的追求》(四),《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3期,第7—9页。

集捐款。据《新华日报》1938年1月19日的报道,贝拉港的华侨救国后援会捐款419英镑。英属东非的华侨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对募捐极为踊跃,除了在大型场合慷慨捐输外,他们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按月扣除捐款。仅从1945年5月至8月南非华文报纸《侨声报》上刊登的月捐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东非一些交纳月捐的组织和个人;达累斯萨拉姆华侨抗日救国会第8期月捐芳名共18人;国民党驻达累斯萨拉姆分部第9期救国月捐共631.1元;东非洲陆军司令部华侨工兵3—7月份救国月捐芳名:颜毓麒、劳宜贤等25人。

在各地还有由当地居民和华侨一起组织的各种援华团体。这种援华组织的领导人多为当地社会贤达,振臂一呼,颇具号召力。各种“援华周”或“中国周”不仅为正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民募得了金钱,也使当地人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了解。

南非“中国周”“援华周”活动表(不完全统计)

举办日期	举办地点	举办组织	负责人	筹得英镑
1943年4月1—10日	约翰内斯堡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J. B. Robertson	7000
1943年9月7日	伊丽莎白港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Justice A. Schauker	不详
1943年	开普敦	援助自由中国基金	Sir Herbert Stanley	8750
1943年12月14—18日	东伦敦			6000
1944年	约翰内斯堡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J. B. Robertson	7500
1944年3月	皇后镇	援华委员会		3200
1944年8月22—28日	德班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5500
无具体日期	金伯利			3000
1945年4月7—15日	约翰内斯堡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不详

“援华周”的活动包括义卖、电影、演剧、游行、画展、收藏品展览、木偶剧、音乐会、舞会、聚餐会、祈祷、拍卖,有的同时举办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讲座。东伦敦的组织者在1943年12月的“中国周”期间发行了一份英文报纸《中国周刊》以助募捐,德班1944年8月的“中国周”还出版了一份《今日中国》。这些活动虽由各地社会贤达所组织,但华人都十分投入。如南非皇后镇只有4户华人家庭,但都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又如开普敦的华人为了感谢当地欧洲人组织“中国周”的活动,在沃德斯托克的市镇厅举行了一个中国式宴会以感谢募捐者。

三

虽然非洲离中国本土甚远,但华侨的爱国精神却十分强烈。抗战爆发后,华侨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一些华侨还亲自参加了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抗战爆发后,非洲的一些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据报道:在

《侨声报》(南非)1945年5月3日,1945年8月2日,1945年8月28日。

叶慧芬、梁瑞来:《肤色、迷茫与让步:南非华人史》,第255—277页;《解放日报》1943年4月23日;《新华日报》1944年1月27日。

一说共获捐款12,000镑。

头半年内,参加回国服务的非洲华侨即有54人,其中女侨胞13人,有的组成非洲汽车工友服务队,他们是自筹资金自带器械回国服务的。1944年日本向贵州进攻,威胁重庆。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号召海外华侨回国参军抗日。毛里求斯有6名青年报名。留尼汪侨领刘文波的儿子刘锡江在岭南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任职于广东省政府,与国内人民一起参加了抗日战争。

其次,在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战争。英国皇家空军在毛里求斯招募空勤人员,华侨青年志愿报名参加。他们中有的在轰炸德国的战斗中失踪。还有的华侨子弟加入皇家陆军工兵部队,在北非参加战斗。毛里求斯华侨刘道舜便是其中一员。当时,英国在东非设有陆军司令部,一些华侨参加了这个司令部的工兵部队,南非的《侨声报》每期刊登的捐款名单均有这些华侨士兵的姓名。再次,华侨参与了保卫侨居国本土的军事活动。英国政府当时在毛里求斯组织了一支守卫本土的部队,其中有一个连全部是由华侨子弟组成。连长为陈跃,副连长为霍恩祺。英国还在毛岛建立过国民军和民防部队,均有华人子弟参加。

然而,亲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毕竟是少数。非洲华侨支持抗战的主要形式是捐款。诚如当时南非东省中华会馆的中文秘书所言:“因为我们远居海外,我们只能用钱来支持。”中国政府对华侨也寄予厚望。1937年冬,侨务委员会派人赴海外各地,以组织募捐,华侨捐款不断汇到国内。《新华日报》1938年关于侨务委员会驻汉口办事处接受捐款的报道提到非洲华侨的捐款情况:南非直属支部9英镑,葡属东非贝拉港华侨救国后援会419英镑,马达加斯加驻图莱亚尔抗日救国分会20,150法郎,马达加斯加抗日救国迭戈-苏瓦雷斯分会20,340法郎。

捐输有各种方式,如救国公债捐、赈济捐、购机捐、寒衣捐、伤兵之友捐等。捐款包括热心捐、长期月捐、节约捐。热心捐是指华侨组织募捐所得款项,活动往往在大型场合或街头进行。如毛里求斯后援会的第一次热心捐于1937年11月进行。后援会本拟将热心捐改为购买救国公债,但华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纯为良心救国之表现,固不望于政府之偿还”。后援会又进行第二次热心捐,成绩斐然。很多在港口停靠的外轮上的中国海员也积极捐款。七七事变后,每年七七抗战纪念日都有捐款活动。

长期月捐主要是指一些有工资收入的华侨每月按时交纳捐款。非洲各地华侨抗日后援组织都采取这种方式募捐。在毛里求斯,月捐是从1937年7月起每月征收,无论大店小店,店东店员,凡有入息者,一律认捐。南非首府比勒陀利亚的侨胞从1937年起每月的捐款由侨领分区收集后,交由驻约翰内斯堡领事馆转交国内;伊丽莎白港抗日救国后援会于1945年4月5日一次即汇出救国月捐1278镑10先令,又于同年4月10日汇出1105镑10先令。除此之外,约翰内斯堡、开普敦、金伯利、东伦敦、弗雷尼京及英属东非、葡属东非、马达加斯加、留尼汪等地的华侨都参加了所在地抗日救国组织的月捐活动。

节约捐则是指各地华侨将自己的节约所得作为对抗战的捐款。这种捐虽数量有限,但来之

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77页。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9日。

陈伊美:《模里斯华侨的爱国热》,第650—651页。

陈伊美:《模里斯华侨的爱国热》,第651页。

《侨声报》(南非)1945年8月30日,11月24日。

不易。蒋介石于1941年3月4日在《战时公债劝募运动告全国同胞书》中特别提到侨胞儿童的爱国情操：“幼小的侨胞子女，拿出他们节省下的饼饵零款，各种各式的热烈情况。”华人商店将伙食费的部分省下作为捐款，儿女满月、祭礼酒会及小学生的糖食费均省下转交后援会。有的老人将客人或亲人送的寿礼作为捐款；也有的华侨将自己的结婚贺礼作为捐款献出来。战时期间，马达加斯加华侨中凡到首府旅游结婚的年轻人都献出自己的贺礼作为救国捐款，总数不下数千元。毛里求斯的一个线业合作社将每月纯息400盾交给后援会。在马达加斯加、南非等地，小学生或向家长讨钱，或将平日的“果饵钱”捐献出来。这样，节约捐如涓涓细流汇入华侨的捐款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义捐包括义卖捐、义演捐和游艺捐。华侨捐献各种物品，通过义卖后将钱款捐献。马岛华侨经常进行义卖，妇女献出的装饰品足一电车，包括金银首饰。毛里求斯的实物捐以捐献首饰的方式开始，最先由《中华日报》社社长李伯宇的夫人陈琼珍女士所倡导，随后全面铺开。这种首饰捐在南非也十分普遍，义演是义捐的另一种形式。华侨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各种业余剧团，如约翰内斯堡华侨妇女剧团，马达加斯加醒群白活剧社和华体剧团，留尼汪救国合群剧社，救国剧社，青年白活剧社和毛里求斯的华人剧团。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排练剧目，将义演所得款项汇回国内。毛里求斯的华侨学生在纪念日举行义演，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德兰士瓦华侨妇女协会由会员挨家挨户去出售戏票。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华侨陈礼德、陈文石的剧团排练了各种节目，在纪念日等场合义演。留尼汪华侨妇女最先行动起来，中华妇女救国会成立的当晚（1937年8月28日）即在圣但尼公演粤剧，当地华侨踊跃前往，演出十分成功。妇女救国会当晚收入的34,144法郎全数汇至南京的中国银行，而当晚的所有演剧费用以及汇费等则由会员们自己承担。

游艺会一般借良辰佳节举行。这种活动的组织工作十分麻烦，但由于十分有趣，对华侨群众颇有吸引力。活动往往由华侨妇女操办。毛里求斯的第一次募捐游艺会是在1937年双十节举行的，由抗敌后援会组织，分为演剧和卖物两个部门。游艺中的物品由华侨商店捐助。卖物部的成绩甚为突出，尤以卖爱国花的收入为最大项，共计收入万余盾。第二次规模较小，是在1938年的春节举行的，由毛里求斯南顺会馆和仁和会馆分别负责。南顺会馆的收入为1400盾，仁和会馆的收入为2000盾，总共3400盾。游艺会的全部收入上缴抗敌后援会，而游艺会的费用则由两会馆自己承担。这种游艺会在其他各地也十分流行，除华侨自行组织外，更多则是在当地“援华周”或“中国周”时期举办。

实物捐。为了更直接地支援前线将士，非洲华侨还组织了实物捐。在这方面，毛里求斯华侨表现突出。抗战初期，国民党驻毛支部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关于募集伤兵医药药物的通知后转交抗敌后援会办理。该会募集的15,000余盾送交驻英大使馆代购，快速寄往中国。其中最贵的一座X光镜正是伤兵医院最需要的。在立体战中，沙包的功用极大，国内抗战亟需麻袋。毛里求斯抗敌后援会劝令华人商店分别捐赠，规定一等店100条，二等店50条，三等店25

《总裁为战时公债劝募运动告全国同胞书》，杨建成主编：《中国国民党与华侨文献初编1908年—1945年》，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版，第68—69页。

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69—70页。

条,私人捐赠更受欢迎。1938年,第一批18,000条麻袋由荷轮运出。荷轮公司为了表示对抗战的支持,免费运送。留尼汪侨胞也为国内抗战捐献旧衣,中华妇女协会曾收集了旧衣64包寄送中国红十字会。

救国公债捐。国民政府自七七事变后陆续发行航空债、救国债、建国债等各种公债。1940年9月,蒋介石为劝购建国债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负责保本保息,另有获利,决无亏折,保障更属万分安全。”1942年10月17日,国民政府又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蒋介石再次发表公告,并许诺:“今日报效一分之财力,他日必效十分之收获。”南非刘浮初老人将储蓄的800镑买了债券,陈树人书“毁家纾难”,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书“卜式输财”以资鼓励。任锡辉共买5000镑,谭祺、林岳云等人动辄二三千。叶迅认为,南非华侨购买救国债达50万英镑。一位经纪人回忆:“我不知道我究竟卖出去了多少公债,肯定多于25,000英镑。领事馆给我一个本,我将人们的姓名和所要买的数目填上,然后,公债从中国寄给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华侨妇女为国募捐功不可没,德兰士瓦华侨妇女协会尤为突出。她们募捐54次,得捐款3万英镑之多。

妇女协会成立的第二天,即元旦,妇女们马上举行抗日献金活动,在4天之内筹得捐款50,000元之多,占历次捐款第一位。

非洲华侨在抗战期间捐款总数究竟是多少,对此缺乏确切的统计。据统计,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21日,非洲华侨捐款2,764,794.16元。根据国民党中央海外部1941年的报告,非洲华侨为伤兵之友捐款数为68,123.23元。叶慧芬指出,1937—1943年,南非华侨将9000英镑寄送中国。叶迅认为,南非华侨的捐款在70万英镑以上(50万镑为“爱国储蓄券”)。留尼汪华侨的捐款达921,828法郎1250英镑。马达加斯加华侨捐款没有完整数字。几笔大的捐款为:1944年5月捐款524.5万法郎;1944年9月汇款3350英镑7先令7便士;1945年12月1日汇往中国驻法使馆163万法郎;桑巴瓦一区自1937年8月15日至1944年底一共汇回祖国246.5万余法郎。毛里求斯华侨捐款也不断汇往国内。在国内报刊中,关于毛里求斯华侨踊跃捐款的报道也不少。如1941年8月5日《新华日报》的简讯载:“近收到毛里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汇来响应出钱劳军捐款英金四百镑,折合国币约三万元。”1944年1月16日的《新华日报》也刊登了一条类似的消息,“全国慰劳总会顷接毛里西亚慰劳分会发来向鄂湘将士致敬电暨劳军捐款二百二十镑。”

上述史实表明,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非洲华侨视抗战后援为己任,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

陈伊美:《模里斯华侨的爱国热》,第652页。

叶慧芬、梁瑞来:《肤色、迷茫与让步:南非华人史》,第271页。

《侨声报》(南非)1947年1月30日。

《侨声报》(南非)1945年3月18日。

转引自李小玲:《非洲华侨与祖国抗战》,第95页。

叶慧芬、梁瑞来:《肤色、迷茫与让步:南非华人史》,第256页。

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69—70页。

《侨声报》(南非)1945年11月8日。

《新华日报》1941年8月5日,1944年1月16日。

情。他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非洲华侨即开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其主要方式是抵制日货。这种抵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华商在进货渠道上自觉不进日货。二是对进口日货或与日本有联系的外国商家进行抵制。三是对进口日货的华商进行谴责和抵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海外华侨谋生的主要渠道是经商,而且大部分是经营小本生意,对日货进行抵制无疑会有损自己的生计。从消费者的角度看,抵制日货也会伤及自身利益。然而,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他们宁肯牺牲自己的利益,坚决抵制敌国的货物。

第二,他们克服往日的歧见,组织了各种抗日后援团体,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第三,非洲华侨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积极投身于抗日捐款。在1947年庆祝德兰士瓦华侨妇女协会成立十周年时,宋美龄给该会寄去了嘉奖状。曾任该会司库的 Ivy Leong 回忆:“蒋夫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她说,如果就人均数而言,南非华侨妇女为战争募捐的数额在所有中国人中间是最多的。”这一对南非妇女的高度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伟大贡献的全体非洲华侨。

[本文作者李安山,北京大学亚非所副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马新民)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Afric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Anshan

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as early as 1930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Africa took action against the Japanese goods and the merchants who sold them. In Madagascar, Mauritius, South Africa, Reunion and other places in Africa, community leaders mobilized Chinese overseas by running new papers and magazines, organizing patriotic dramas and film shows, collecting different donations through various organizations. As their country fellow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Africa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ir motherland during the War.

Distorted Image: Greeks and Romans' Misinterpretation of Judaism

Song Lihong

Ever since Matthew Arnold, i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at the two great sourc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re Hellenism and Hebraism. However, the general Greco-Roman attitudes toward Jews and Judaism bear a negative and sometimes even malicious character. Such Jewish peculiarities as the nature of the Jewish god, dietary restrictions, laws pertaining to Sabbath, the practice of circumcision and so on not only most interested the pagans but stimulated their concentrated misinterpretation as well. The distorted image of Jews thus resulting from the pagans' lack of incentive to know more about Judaism contributed to the surge of particularism within Judaism, which in turn deterio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ws and Gentiles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rise of large-scale anti-Semitism in Middle Ages.